

国内翻译类访谈综述:2009—2018

殷海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自2007年我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启动以来,与翻译相关的学术活动日渐频繁,翻译类访谈也日益增多。通过梳理“中国知网”2009至2018年十年间所刊发的翻译类访谈,并按照国籍、民族身份、学术领域等对访谈对象进行归类,指出不同时期访谈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从学术严谨性的视角,针对如何合理运用访谈更好地解决翻译研究中的问题,提出以下两点建议:1)从访谈过程、访谈论文格式、访谈论文著作权等方面规范翻译类访谈研究;2)结合深度质性访谈进行深入的翻译学研究。

关键词:翻译;访谈;特征;严谨性;建议

中图分类号: H 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0)03-0215-05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20.03.003

A Review of Journal Interview Articles about Translation:2009 – 2018

YIN Haihong

(School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year of 2009 to 2018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journal interviews about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shown the increasing trend. Based o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this essay tries to classify the journal interviews about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from the year of 2009 to 2018 according to nationalities or academic interest of the interviewees, and then analyze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Two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for improving the scholar rigorous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journal interview articles: First, the form of journal interviews should be standardized. Second, the method of deep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uld be adopted.

Keywords: translation; interview; character; rigorousness; proposals

自21世纪初加入国际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学术等方面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07年我国启动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试点工作,这对翻译学科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截至2017年,我国已有200多所学校开设翻译硕士专业,对我国翻译学科建设、翻译研究、翻译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翻译学术交流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和平台。

逐渐增多的国内外翻译学术会议、讲座等为青年学者、教师提供了更多与专家或知名学者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以访谈形式记录交流的重要内容并将其整理、发表,有助于形成更广泛的学术影响。访谈作为一种学术文体,具有简洁性、时效性和前瞻性特征,但人们对访谈的原创性、学术规范性以及严谨性始终存在质疑,对质疑背后的原因却鲜有人探讨和研究。

收稿日期: 2019-10-27

作者简介: 殷海红(1980-),女,讲师。研究方向: 翻译学、翻译理论与实践。E-mail: haihongyin2011@163.com

本文以“中国知网”2009年至2018年翻译类访谈论文为基础,梳理其发展变化过程,总结不同阶段的成果及其特点和规律,指出访谈在转录、翻译过程中存在的规范性和原创性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访谈文体规范、访谈目的、多元化方式以及如何合理利用访谈进行翻译学研究等方面提出个人的见解和思考。

一、国内翻译类访谈的进展状况: 2009—2018

通过对2009至2018年翻译类访谈论文的收集和分析,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我国翻译类访谈从数量、类别、专业性和丰富性等方面均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首先从数量上看,2009、2012、2013、2016年分别发表2篇,2010、2011年分别为4篇,2014年5篇,2015年9篇、2018年7篇,2017年达到峰值10篇。这十年访谈类论文发表数量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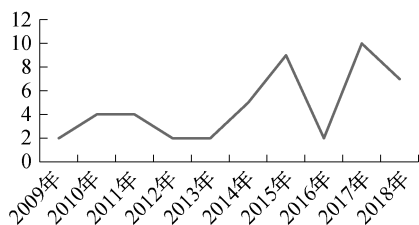


图1 翻译类访谈论文发表数量的变化趋势:2009—2018

Fig.1 The number trend of interview papers about translation:2009-2018

除了数量上的总体变化之外,通过分析访谈目的、类别和内容,可大致分为“尝试”(2009—2011)、“发展”(2012—2015)和“爆发”(2016—2018)三个阶段。

(一) 翻译类访谈的“尝试”(2009—2011)

首先,这一阶段访谈论文的数量较少,每年有2~4篇。其次,访谈的对象构成趋于单一化,2009年发表2篇,其访谈对象均为外籍作家、翻译家或汉学家,如:黄德先对英国著名文化翻译派领军人物苏珊·巴斯奈特女士的访谈;朱琳等对美国翻译理论家道格拉斯·罗宾逊教授的访谈。

2010至2011年,每年的论文数量增加至4篇。访谈对象除了对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伊恩·梅森、国际翻译学院联合会主席 Hannelore Lee-

Jahnke(日内瓦大学教授)等外籍专家的访谈外,还有潘华凌对我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吕俊的访谈、李玲对“两会”中从事蒙古、藏、彝、壮等翻译工作的7位民族翻译专家的访谈。总体来看,这一阶段访谈数量相对较少,访谈对象逐渐从外籍专家转向国内著名学者。

(二) 翻译类访谈的“发展”(2012—2015)

2012至2018年,访谈论文数量从12篇增至18篇,访谈对象更加多样化,打破了英语语言的翻译家、翻译理论家的单一结构,对其他语种的翻译专家如俄罗斯沃斯克列辛斯基、我国法语翻译家许均等,维吾尔语翻译家曲伯庆等的访谈。此外,访谈对象还包含了国际组织资深译员 Anne Lafeber、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外籍翻译家马克·本德尔、著名的外籍汉学家葛浩文以及我国文学翻译家林少华等人。

同时,访谈对象转向国内外不同领域学者,比如对视听说研究领域的英国知名学者 Jorge Diaz Cintas 的访谈。访谈的视角趋于多样化,如从欧洲高校翻译人才多元化培养方式视角,对国际翻译院校联盟主席 Frank Peeters 的访谈;从社会学角度对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 Mona Baker 的访谈;从语言服务的现状与困境的视角对来自翻译协会、版权贸易基地、语言服务传播公司的三位专家的访谈等。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将访谈作为研究手段介入翻译教学、翻译行为或事件等进行了质性、实证性研究,如《对英语专业学生小组电子翻译作业的在线访谈研究》《译者胜任力构建:共词分析、翻译行为事件访谈与实证研究》等论文的出现,为访谈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展现了更广阔的研究领域。

总之,与2012年以前的访谈相比,这些访谈更具学术目的性和明晰的访谈视角,使访谈所涉领域、对象和内容更加多样化。

(三) 翻译类访谈的“爆发”(2016—2018)

继2015年9篇访谈类论文之后,2016年出现了暂时的停顿,但2017年在数量和多样性上均形成了访谈类论文的“爆发”趋向。

2017至2018年发表的17篇访谈的共同特征是:访谈目的更加聚焦在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翻译传播和影响。代表性的访谈有:易彬的《让荷兰读者知道中国文学是多么有意思——荷兰青年汉学家施露女士访谈》、朱振武的《拿出

“最好的中国”——朱振武访谈闵福德》、东海雅的《中国影视在澳洲的翻译与传播——澳大利亚国家电视台 SBS 总字幕师韩静博士访谈》、马晶晶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翻译的实践和探索——马克·本德尔教授访谈录》等。这一特点足以说明近几年来，我国翻译领域的学者们通过学术研究、交流等方式积极响应“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号召，试图探索中国文学翻译、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因此形成了一种“访谈热”现象。

另外，访谈内容覆盖面也更广，除了宏观的“文化走出去”类访谈外，许多学者从具体领域着手研究我国经典文学作品、代表性作家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力。比如，吕周聚^[2]就鲁迅在日本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对日本藤井省三教授做了访谈，访谈中介绍了鲁迅研究在日本的代表性学者及其研究的切入点、特点和方法等。另外，张仪宏^[3]访谈了《金瓶梅》的译者芮效卫（David Roy），探讨其文学价值和翻译难点，David Roy 教授将《金瓶梅》这部著作描述为：了解中国古代服装、习俗、食物、宗教仪式、政治腐败的“百科全书”。

除了以具体作家或作品的影响与价值为导向的访谈外，其他视角的访谈有：周开林对中医翻译家方廷钰的访谈；刘燕从中国哲学与文学阐释的角度对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访谈；刘明从翻译的术语学角度对奥地利知名术语专家 Gerhard Budin 教授进行的访谈等等。总之，2016—2018 年的访谈目的性更强，注重从中国文化传播、文学翻译等角度寻找适当的访谈对象，访谈更有学术针对性，在探索“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有效途径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

二、基于访谈对象的归类和特点分析

（一）对国外译者、作家及汉学家的访谈

根据统计，2009—2018 年来自“中国知网”的访谈论文共约 45 篇，其中有 30 篇是对国外译者、作家或汉学家的访谈，所占比例达 66.7%。访谈者分别来自欧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在翻译领域有显著成果的专家或学者，比如苏珊·巴斯奈特、葛浩文、顾彬等，另有国际翻译联合组织相关人员，如 Hannelore Lee-Jahnke、Frank Peeters 等。这类访谈是了解国外翻译专家关于特定学术问题思想观点最直接的方式。在孟祥春^[4]的《我只能是我自己——葛浩文访谈》中，读者可以直接了解中国文学重要译介者葛浩文对翻译理

论的态度，对计算机辅助翻译等问题的观点。此外，对国外知名学者的访谈有助于了解国外翻译领域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从张娟和熊兵^[5]的《视听翻译教学：过去、现在和未来——Jorge Diaz-Cintas 教授访谈》中，读者可以了解到视听翻译课程在国外开设的现状，包括课程设置、考核方式等，也包括 Jorge 对视听翻译教学发展趋向的预测与展望：未来会开设 Respeaking、Video Game 等课程，有助于未来结合语音识别系统将复述出的内容直接转化为字幕。这些前瞻性的看法，对了解国外翻译教学的发展以及发展方向大有裨益。

但是，对外籍学者的访谈仍然存在目的性不强、缺乏严谨性的问题，部分访谈对外籍访谈对象缺少基本信息介绍，如黄德先^[6]在《译者形象的重构——伊恩·梅森访谈》中忽略了被访者的介绍信息。在访谈《你是谁？世界从何而来？——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德访谈》和《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未来——苏珊·巴斯奈特访谈》中，未能提出核心的、有待解决的、具有争议性或前瞻性的问题。

（二）少数民族学者、翻译家的访谈

对少数民族翻译家或相关学者的访谈仅有 7 篇，其中 4 篇主要集中在近两年。对民族学者的访谈起步晚，关注者较少，但从近几年的发表情况来看，对这一领域进行的关注和访谈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目前，这一领域的外籍译介者主要有美国翻译家马克·本德尔，黄立、马晶晶^[7]分别对他进行了访谈，并发表了《走向世界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学——Mark Bender 教授访谈录》《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翻译的时间和探索——马克·本德尔教授访谈录》，呈现了他对我国苗族、瑶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的英译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独特的译介模式。对国内汉蒙、汉维（维吾尔语）、汉藏等翻译家的访谈，如顾葳蕤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访汉蒙翻译名家阿拉坦巴根先生》、吴婧的《融通语言的表达，跨越民族的讲述——访汉族维吾尔与翻译家曲伯庆先生》，有助于人们了解国内少数民族翻译家为翻译所做的努力与贡献，解析他们的翻译思想以及面临的困境，对促进我国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不无裨益。

（三）多个被访者、被访对象或基于多次交流的访谈

对近十年访谈的整理统计可知，约有 7 篇访谈

论文基于多个采访对象或多次访谈交流,如张静、袁晓艳^[8]的《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林少华、任东升教授访谈》,对文学翻译家林少华和任东升教授同时进行了访谈,访谈者的提问极具技巧性,不但清楚地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同时还能通过一个问题的提出,促进两位访谈者之间的互动,对多人同时进行采访的提问方式、技巧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潘华凌^[9]的《筌路蓝缕 学而不泥——著名翻译理论家吕俊教授访谈录》则记录了对吕俊先生的多次深度访谈。赵文静、胡海珠^[10]的《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叙事建构研究——访谈著名翻译理论家 Mona Baker 教授》,由两位访谈者交替提问,问题更全面,与访谈对象的互动性话语也更多。

基于多对象、多次交流的深度访谈目前我国仍较为少见,虽然这类访谈难度更大,但从学术性上来讲更具可靠性和说服力。深度访谈对访谈技巧提出更高要求,访谈者须对访谈法有科学的认识,访谈前需做充足的准备,包括对访谈对象信息的全面掌握以及在访谈问答技巧、经验、访谈设备、时间、地点等方面的准备工作,才能通过访谈最大化地获得关键性的、客观性的信息。

(四) 访谈作为质性研究的一种方法

从近十年的访谈来看,我国学者主要采用一对一的访谈形式,访谈的结果以对话形式直观地呈现给读者,访谈传达的主要信息、观点往往不够明朗,很难看出研究者通过访谈想要传达怎样的学术信息。访谈性学术论文以简单整理并还原对话为特征,力求以生动、直接的方式呈现被访者的话语和观点。但访谈类论文从整体谋篇来看,存在缺少逻辑性和系统性归纳等问题,往往提供大量碎片化信息,这正是访谈类论文学术价值受到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翻译类访谈在大纲设计、访谈过程、转录和论文格式等方面均缺少一定的规范性。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看,访谈常被视为质性研究时收集资料的一种方法,通过多次半开放性访谈或开放性访谈收集资料,再将这些资料整理应用于具体研究中。相对而言,我国仅有少部分学者将访谈作为辅助方法进行质性研究,近十年知网访谈论文中仅有5篇采用这种方法,占总数比例约11%。其中,2篇关于翻译教学的是《对英语专业学生小组电子翻译作业的在线访谈研究》《西班牙

语本科口译教学新探——基于北京六所高校的调查和访谈》,另3篇关于译者能力、翻译行为研究和翻译家思想研究。例如,孟祥春^[11]将葛浩文演讲内容与访谈结合,并参照访谈对象的翻译实践,最后将葛浩文的基本思想归纳为:译者之“用”,即译者价值;译者之“道”,即翻译的方法论;译者之“质”,即翻译的认识论;译者之“我”,即译者的自我认知与定位。总之,不同于直接还原、罗列对话的访谈论文,而是以访谈为基础,同时结合其他方法研究译者思想和观点,该文在逻辑性、学术严谨性上更胜一筹,更具借鉴价值。

三、翻译类访谈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基于对“中国知网”近十年发表的翻译类访谈论文的研究,本文将其中的问题进行归类分析并试图提出以下个人思考与见解。

(一) 访谈论文的呈现形式缺少规范性

根据本文对45篇访谈论文统计结果可知,文末附有参考文献的访谈大约有10篇,附有注释的约7篇。关于完整的访谈论文是否须包含摘要、引言、访谈对象介绍,访谈对象简介应该置于引文还是摘要部分等问题尚缺少统一的规范与标准。

此外,部分论文对访谈工作的分工、转录、翻译等做了注明,如《拿出“最好的中国”——朱振武访谈闵福德》^[12]一文对访谈时间、地点都做了清楚的说明,并注明访谈语言为英语,译者为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MTI研究生陈菲,但多数访谈并无相关信息介绍。关于访谈论文署名,部分将访谈对象作为第一作者,多数将访谈者作为第一作者,而访谈转录工作者、翻译者普遍未注明或提及,这些往往涉及论文版权或原创性等问题。另有部分访谈无摘要、访谈对象简介、参考文献以及注释等信息,如孟祥春^[4]的《我只能是我自己——葛浩文访谈》,除译者简介外,摘要、参考文献、注释、致谢等信息均无。

关于访谈类论文到底需不需要进行章节划分,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目前所统计的访谈论文中,有清晰章节划分的访谈约有8篇,而进行章节或主题划分对转录访谈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时甚至会打乱原访谈的时间先后顺序,但从访谈呈现的结果来看往往更清晰。显然,主题和板块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访谈类论文的学术传播力。就目前翻译类访谈而言,这些方面仍存在一定

的规范性问题，需要更多的学者给予关注和探讨，不断提升其学术严谨性，如此才能更好地在翻译学研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实现其学术价值。

（二）论文缺乏明晰的研究目的

访谈论文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多数研究者在访谈前对访谈对象的成就、著作等进行大量的阅读和准备工作，访谈问题往往围绕着访谈者，而不是研究者的疑惑或问题。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访谈论文中，以陈琳的《你是谁？世界从何而来——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德访谈》为例，访谈主要围绕《苏菲的世界》这部小说的体裁问题、在欧洲诸国的译介与发行、作家的环保思想等提出了多个问题，但读者很难从中看出访谈者的视角和目的。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好的访谈从题目到问题都设定了特定视角，访谈者在访谈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提问围绕某一方面的系列问题，即访谈者带着问题或困惑进行访谈，可参阅以下几篇访谈：《挣脱理性桎梏，回归人文关怀——美国翻译理论家道格拉斯·罗宾逊教授访谈》《译者形象的重构——伊恩·梅森访谈》《翻译的使命与翻译学科建设——许均教授访谈》。

（三）部分访谈缺少时效性

一般而言，访谈类论文应更注重时效性。访谈者在制作访谈大纲时尽可能关注现在和将来的问题，对距今久远的作品、理论、观点或问题可尽量缩小比例。比如访谈《视听翻译教学：过去、现在和未来——Jorge Diaz-Cintas 教授访谈》，对这一比例的安排相对合理，主要集中于目前英国视听翻译教学的研究现状以及对未来的预测和展望。而在黄德先^[13]的《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未来——苏珊·巴斯奈特访谈》中，访谈者多次提及苏珊在15年甚至20年前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访谈者不得不反复重申，那只是当时的观点。另外，访谈论文需要在访谈后及时对访谈资料做出整理并着手发表工作，大多访谈中的观点和问题只有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具有有效性，但一些访谈者往往会忽略这一点。比如，《〈金瓶梅〉英译本：了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窗口——芮效卫教授访谈》的访谈时间是2014年，而发表时间是2017年，在这篇访谈发表时，被访谈者已经过世，虽然这篇访谈未必会完全失去时效性，但对访谈类论文的时效性问题还是应该引起注意。

（四）可参考性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规范访谈研究

对于访谈论文的格式，可尝试对其进行规范化。可尝试对同一种刊物中刊发的访谈进行规范化要求，比如摘要、引言、访谈时间、地点、转录者、翻译者的注明以及对参考文献、注释、致谢等信息的完整性要求。半开放型访谈须有明确的研究目的，应制定完整的访谈大纲，访谈对象尽可能聚焦某一研究领域权威专家，从而提升访谈的有效性。总之，访谈者需要了解访谈法的相关知识，包括在访谈前接受专业的指导和训练，有助于提高访谈的有效性。

2. 关注深度质性访谈

访谈作为质性研究的重要方法被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普遍采用，西方学者针对质性研究中的访谈发表了一系列代表性的著作，如《质性访谈方法：聆听与提问的艺术》《质性研究访谈》等，国内的著作有《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质性研究概论》等。在翻译学研究中，对单个或多个访谈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多次访谈，将访谈作为一种获取资料的方法用以辅助翻译研究，将有助于翻译类访谈提高其学术严谨性，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与作用。

四、结束语

翻译类访谈以最直接的交流方式与翻译家、汉学家、翻译教学者等进行面对面交流，在第一时间获取真实的一手材料，将翻译学领域权威专家的思想、理论、观点等以最直接的方式传递给读者。访谈类学术论文在学术交流、引导学科发展趋向等方面有着自身鲜明的特征和优势，其中常常包含了普通文献中无法查阅的、隐藏在文字背后的重要信息。笔者通过对翻译类近十年访谈论文的分析，探寻我国翻译类访谈的发展轨迹及特征，并针对规范性、学术严谨性等方面总结问题并提出个人观点。由于仅限于知网中近十年的翻译类访谈，难免有疏漏，所提出的部分问题和观点不乏偏颇，但本文意在通过探讨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访谈促进翻译学术与研究的发展，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关注，从而不断提高翻译访谈类论文的学术性和严谨性。

（下转第237页）

- Learning Strategies[M]. London: Routledge, 2013.
- [25] DEXTER D D, HUGHES C A. Graphic organizers and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A meta-analysis[J]. Learning Disability Quarterly, 2011, 34(1): 51-72.
- [26] ROTT S. The effect of exposure frequency on intermediate language learners'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d retention through reading[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99, 21(4): 589-619.
- [27] SÖKMEN A J. Current trends in teaching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C] // Schmitt N, McCarthy M. Vocabulary: Description, Acquisition and Pedag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37-257.
- [28] CHAMBERS A, DAVIES G. ICT and Language Learning: A European Perspective[M]. Lisse: Swets & Zeitlinger B. V., 2001.
- [29] SWAIN M.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ome roles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and comprehensible output in its development[C] // Gass S, Madden C.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1985: 235-252.
- [30] NATION I S P. Learning Vocabulary in Another Langu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31] LEE S H. ESL learners' vocabulary use in writing and the effects of explicit vocabulary instruction[J]. System, 2003, 31(4): 537-561.
- [32] BUENO-ALASTUEY M C. Perceived benefits and drawbacks of synchronous voice-based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J].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011, 24(5): 419-432.
- [33] ESLAMI Z R, MIRZAEI A, DINI S. The role of asynchronous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the i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FL learners' pragmatic competence[J]. System, 2015, 48: 99-111.
- (编辑: 朱渭波)

(上接第219页)

参考文献:

- [1] 尚亚宁. 我国高校翻译硕士专业发展: 现状、问题与对策[J]. 现代教育科学, 2011(4): 71-75.
- [2] 吕周聚, 藤井省三. 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藤井省三教授访谈[J]. 社会科学辑刊, 2017(3): 149-154.
- [3] 张义宏. 《金瓶梅》英译本: 了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窗口——芮效卫教授访谈[J]. 东方翻译, 2017(3): 44-48.
- [4] 孟祥春. “我只能是我自己”——葛浩文访谈[J]. 东方翻译, 2014(3): 46-49.
- [5] 张娟, 熊兵. 视听翻译教学: 过去、现在和未来——Jorge Diaz-Cintas 教授访谈[J]. 上海翻译, 2018(3): 89-93.
- [6] 黄德先. 译者形象的重建——伊恩·梅森访谈[J]. 东方翻译, 2010(1): 47-51, 75.
- [7] 马晶晶, 穆雷.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翻译的实践和探索——马克·本德尔教授访谈录[J]. 东方翻译, 2017(5): 47-51, 67.
- [8] 张静, 袁晓艳. 文学翻译: 理论与实践——林少华、任东升教授访谈[J]. 东方翻译, 2012(1): 37-43.
- [9] 潘华凌. 筌路蓝缕学而不泥——著名翻译理论家吕俊教授访谈录[J]. 宜春学院学报, 2010, 32(3): 145-149.
- [10] 赵文静, 胡海珠. 社会学视阈下的翻译叙事建构研究——访谈著名翻译理论家 Mona Baker 教授[J]. 中国翻译, 2015, 36(1): 67-70.
- [11] 孟祥春. 葛浩文论译者——基于葛浩文讲座与访谈的批评性阐释[J]. 中国翻译, 2014, 35(3): 72-77.
- [12] 朱振武, 闵福德, 陈菲. 拿出“最好的中国”——朱振武访谈闵福德[J]. 东方翻译, 2017(1): 50-56.
- [13] 苏珊·巴斯奈特, 黄德先. 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未来——苏珊·巴斯奈特访谈[J]. 中国比较文学, 2009(2): 15-22.
- (编辑: 朱渭波)